

德语国家的鲁迅研究视角新形势

骆超群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 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众多国家中也有较大的影响。在德国,他的多部作品很早就开始被翻译和出版,并引起学者的关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鲁迅及其作品。时至今日,德语国家的学者和译者对鲁迅的研究和翻译仍在不断发展。他们的研究发展到何种角度、广度和深度,并得出什么结论,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鲁迅; 德语国家; 研究视角

1. 鲁迅作品在德语国家的翻译历程

相比英语国家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德语国家在时间上相对落后一些。“直至1935年汉学家阿尔弗雷德·霍夫曼(Alfred Hoffmann)翻译发表了鲁迅小说《孔乙己》德语区才有了鲁迅作品的德译本。1936年和1937年亨利希·艾格特(Heinrich Eggert)又翻译了另外两篇鲁迅的小说。”^[1] 鲁道夫·申德雷格(Rudolf Schindelegger)翻译的《呐喊》于1946年出版,《彷徨》1950年出版。

二战后德国分裂,东德在50年代翻译了大量的鲁迅作品。60年代末到70年代欧美国家盛行的激进主义,鲁迅受到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推崇,美国、意大利、法国和西德等国的左派翻译了一批鲁迅的作品。^[2]

“德语译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在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鲁迅选集》,该选集翻译了鲁迅的全部小说和诗歌,杂文集《坟》,以及散文诗集《野草》,是德语国家的一批学者历时15年精心翻译出来的成果。该选集的主编是时任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的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3]

进入21世纪以来,鲁迅的作品在德语世界的翻译逐渐增多,格格·齐尔克(Gregor Zielke)2006年出版《狂人日记》译本,让《狂人日记》以现代德语重新呈现,受到广泛关注。理安·温泽(Lian Wenzel)翻译了《阿Q正传》和《呐喊》中的部分短篇,于2014年出版,此译本力求保留鲁迅作品的原汁原味。此外,鲁迅的作品还可能会在文学选集中或相关研究书籍中被部分翻译,具体作品和译者可能会有所变化。

2020年,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出版了《Kindlers文学丛书》,其中包含了沃尔夫冈·顾彬撰写的《鲁迅》一书和翻译的4部作品《朝花夕拾》《彷徨》《呐喊》以及《鲁迅散文集》。

在德语国家,一些文学爱好者、学者和研究者会阅读和研究鲁迅的作品,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德国社会的变迁。同时,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可能会开设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课程或研究项目,吸引更多人深入学习和探讨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意义。虽然鲁迅的作品在德国可能不像某些西方文学作品那样广为人知和流行,但在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群体中,鲁迅的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通过翻译、介绍和学术研究,德国读者有机会接触和深入理解鲁迅的作品,从而拓展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2. 20世纪鲁迅研究在德语国家的发展历程

德国第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是由一位中国女性撰写,王铮如(音译)于193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鲁迅——生平及著作:中国革命研究》,并发表在柏林大学学报的国际版,欧洲的汉学家广泛阅读此论文,她的一些观点也一再被鲁迅研究者引用。^[4]

伊丽莎白·施耐德(Elisabeth Schneider)于1979年发表的论文《Skizze einer literarischen Zeitschrift: Die Anfänge der Yu si und ihre Zielsetzung》(文学期刊掠影:《语丝》的起源及其目标)梳理了该期刊的发展历程以及鲁迅对杂志发展发挥的作用。鲁迅是《语丝》早期的出资人之一,第四卷第1期到第47期的主编。但到了后期,在给妻子许广平的一

封信中鲁迅评价《语丝》：“虽然现在北京的印刷品比以前多，但好的印刷品很少。《语丝》关心抵抗精神，但有时会表现出疲惫的迹象，因为太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内部情况，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点绝望。”施耐德肯定了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她认为自从《语丝》从北京迁到上海后，尤其是鲁迅辞职后，《语丝》与中国的实际发展脱节，最终使该杂志变得无足轻重。^[5]

汉堡大学教授伯恩特·埃伯斯泰因（Bernd Eberstein）在 1994 年为 6 卷本《鲁迅选集》撰写书评，他认为：“鲁迅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他总是深入地研究当下，也研究文学和哲学传统以及他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并以引用和典故的形式将这些内容融入他的作品中。鲁迅与祖国和同胞的亲密和距离的并立和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作品张力。”同时他也高度评价了这套书的出版无疑是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鲁迅是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作家，此系列丛书也很适合让德语区的读者了解鲁迅。^[6]

1995 年，迈克尔·奎林（Michael Quirin）在《Die chinesische Intelligenz und die Macht》（中国智慧和权利）一文中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例，论证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许多具有科学技术背景，如鲁迅学习医学。这可能与现代欧洲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有很大不同，后者往往与对世界的科学技术理解相分离。^[7]讨论了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和政治变革中的角色，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与挑战。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政治参与中的重要性及局限性。通过历史和现状的对比，强调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复杂位置。

Aizheng Chen 在 1996 年的专著《Numerative und Numerativkonstruktionen im Deutschen und im Chinesischen》（德语和汉语中的数值和数值构造）一书中提到，Kaden 和 Dragunov 分别于 1964 年和 1960 年研究过鲁迅作品中的名词复数表达，即“们”的用法，诸如“蟋蟀们”“鸟们”“覆盆子们”“木莲们”和“眼睛们”，对于这些动植物拟人化的介绍，赋予了特别的感情和爱，这在童话故事或以儿童思维的描述中比较常见。^[8]

张芸 1999 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别求新声于异邦——论鲁迅与西方文化》从多个层面研究了鲁迅与欧洲文化的关

联。^[9]同一年，克雷门思·特里特（Clemens Treter）发表《Erzählsituationen, Ich-Erzähler und Ich-Formen bei Lu Xun》（鲁迅的叙事情境、第一人称叙述者与第一人称形式）。他认为，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西方汉学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鲁迅作品的文学和叙事技巧方面，而在此之前更多地从社会和政治视角研究鲁迅作品。20 世纪 80 年代的分析越来越多地试图借助西方文学研究中建立的方法和模型进行解释，正是形式上的创新塑造了所谓的“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的特征。90 年代，汉学受到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对文本本身的关注往往被忽视。而 Clemens Treter 以鲁迅的短篇小说叙事情境分析为例，指出文本工作仍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10]作者运用 Frank K. Stanzel 的叙事理论分析了鲁迅作品中的叙述情境、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一人称形式的运用。他发现，鲁迅一半以上的短篇小说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狂人日记》采用双第一人称叙述者、《阿 Q 正传》中传统叙事态度的反讽以及《示众》的没有叙述者。鲁迅叙事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各种社会现实、叙述者的观点、其他人物以及他自己作为作家的态度之间建立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张力场，从而能够以一种往往崇高的方式将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11]

3. 21 世纪鲁迅研究在德语国家的发展历程

托马斯·土博纳（Thomas Täuber）在 2004 年以《Chinas neuer Heiliger: Lu Xun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中国的新圣人：鲁迅在中国的地位）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研究了从 1937 年 10 月毛泽东在鲁迅去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到 20 世纪后期鲁迅一步步被神圣化的过程，也论及 80 年代以来严肃的学者对鲁迅非神圣化研究的可贵探索。^[11]

安娜·施泰希（Anna Stecher）在她 2012 年发表的论文《鲁迅戏剧化——革命戏剧化？〈阿 Q 正传〉戏剧改编研究》中，以《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一书中余华对于鲁迅的评价为出发点，提及多位党的领导认为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并赋予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关键地位。鲁迅作品的戏剧化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兴起，在 50-70 年代蓬勃发展，直到鲁迅 100 周年诞辰达到高潮，之后戏剧人在试图多维度地发掘新的鲁迅及其作品。《阿 Q 正传》改编过程中，革命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方面是作者鲁迅，他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伟大的革命家”；另一方面是参与革命的阿 Q 本人的故事。《阿 Q 正传》中的革命在舞台上的不同时期

的表现形式不同, 以及作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12] 之前的作品比较尊重原著作品, 而进入 90 年代以后, 鲁迅作品的戏剧改编更加多样化, 1996 年, 台湾演出了京剧版本的鲁迅作品, 孟京辉在北京执导话剧《阿 Q 同志》, 河南省曲剧团表演《阿 Q 与孔乙己》。1997 年徐瑛与 Vitoria Marks 合作把《阿 Q》搬上美国的舞台。鲁迅其他作品如《故事新编》《圈》《鲁镇往事》陆续改编成戏剧。^[12] 通过多种舞台形式和戏剧改编来呈现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批判, 特别是阿 Q 这个角色作为封建思想和自我欺骗的象征。不同版本的戏剧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重新阐释鲁迅的文本, 这些改编影响观众对革命、身份和社会变革的理解。戏剧的重要性在于激发观众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反思, 通过表演艺术传达鲁迅的思想与批判。

近年来, 一些德国学者对于鲁迅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鲁迅的文学作品, 而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了鲁迅作为作家所产生的世界文学遗产的物质性, 例如研究纪念鲁迅的场所、物品、媒介等方面。2017 年,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艾米丽·格拉芙 (Emily Graf) 提交的博士论文题为《Lu Xun on Display: Memory, Space and Media in the Making of World Literary Heritage》(展示鲁迅: 世界文学遗产形成中的记忆、空间与媒介), 围绕中国作家鲁迅的制度化进行深入研究。她探讨了鲁迅的生平和作品如何在不同的空间中被接纳和诠释, 包括文学、艺术和教育领域。这种空间的多样性影响了人们对他的理解和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 媒介的变化, 如书籍、电影、互联网, 对鲁迅形象的传播和解读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媒介使得鲁迅的思想和文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流传与再创作。在文学研究中, 作者博物馆常常受到质疑, 因为它们推动了一种以作者为中心的阅读方式, 这一观点受到新批评派和接受理论学者的反对。关于“作者即英雄”的概念, 引发了学者们的怀疑, 认为这些机构会将作者工具化, 并诱导无辜的读者成为“文学游客”或无意崇拜者。作家博物馆在世界与比较文学研究中仍然是一个未被充分探讨的领域, 在博物馆学界也因其边缘性而受到忽视。这种对作者作为英雄的文化道德禁忌仍然存在全球纪念作家的实践中。^[13]

2019 年, Xiaomin Zhou 完成博士论文《Erlebte Rede in der literarischen Übersetzung - am Beispiel von Robert Musil, Franz Kafka und Lu Xun》(文学翻译中的经验话语——以罗

伯特·穆西尔、弗兰兹·卡夫卡和鲁迅为例), 从叙述技巧、主题、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接受的差异等方面, 对比鲁迅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叙述技巧方面, 鲁迅在其作品中通过内心独白展现人物的心理状态, 而卡夫卡等作家也采用类似的技巧来表达角色的内心冲突和社会异化。主题的对比方面, 鲁迅的作品常常聚焦于社会批判和个体的心理挣扎, 而卡夫卡的作品则更多地探讨存在主义和荒诞性。文化背景的影响, 鲁迅的作品反映了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冲突, 而西方作家的作品则受到各自社会背景的影响。这种文化背景的对比帮助读者理解鲁迅作品的独特性以及其在全球文学中的位置。翻译与接受的差异, 在翻译鲁迅的作品时, 翻译者往往需要采取更为灵活和创造性的策略, 以便将鲁迅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细腻的语言风格有效传达给西方读者。而在西方作品的翻译中, 虽然同样需要注意语言和风格, 但由于文化背景相对接近, 有时可以采用更直白的翻译方式。接受度与影响力方面, 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独特的, 他的作品反映了对国家和社会转型的深刻思考。相较之下, 穆西尔和卡夫卡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现代主义运动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但他们的作品在全球文学中的影响力和接受程度则与鲁迅的情况不同。在某些方面, 鲁迅的作品在西方的接受往往受到政治和文化语境的影响。^[14]

2021 年,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艺术史教授比尔吉特·梅尔斯曼 (Birgit Mersmann) 出版《Über die Grenzen des Bildes: Kulturelle Differenz und transkulturelle Dynamik im globalen Feld der Kunst》(超越图像的边界: 全球艺术领域的文化差异和跨文化动力) 一书, 从艺术史的角度评价了鲁迅作为版画家的贡献。她认为鲁迅推动了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 (Käthe Kollwitz) 作品在东亚的传播。珂勒惠支的作品首次被鲁迅先生介绍到中国, 并且 1936 年在上海出版了版画集。鲁迅被视为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先锋, 对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过他在中国版画运动的改革也影响了东亚, 尤其是韩国版画的发展。^[15] 在此之前, 1987 年 Heike Kotzenberg 出版了《Der revolutionäre Holzschnitt Chinas. Künstler aus dem Umkreis von Lu Xun》(鲁迅身边中国艺术家的革命木刻) 一书, 书中介绍中国木刻艺术的发展历程, 尤其是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以及鲁迅作为文人和革命家的角色。分析一群与鲁迅有联系的木刻艺术家的作品, 他们通过木刻艺术表达对社会不公和压

迫的抗议。这些艺术家通常融入社会现实和革命精神，创造出具有强烈政治性和民族性的作品。评价这些木刻作品在中国文化和艺术界的影响，激发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并且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鲁迅作为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和作品影响了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为推动木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6]

2022 年，Lianhua He 出版《Geschichtsphilosophie als Literatur – Intertextuelle Analysen zum Werk Heiner Müllers》（作为文学的历史哲学——海纳·穆勒作品的互文性分析）一书，个别章节提到了海纳·穆勒对鲁迅的喜爱之情。如中国现代讽刺作家鲁迅等作家，尽管受到国家镇压，但他们写的是社会的衰落，批评这个制度。海纳·穆勒特别欣赏中国诗人和作家的内容和写作风格。例如，1953 年，他向德国观众展示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讽刺作家鲁迅。1954 年，穆勒将他的散文作品从英语翻译成德语，并以雅各布·萨贝斯（Jakob Sabest）的笔名出版。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视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启蒙知识分子。他也是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尼采翻译家和接受者之一。穆勒称他为“中国高尔基”，意思是鲁迅“在中国完成了批判现实主义，从而铺平了社会主义道路”。^[17]1953 年 9 月 20 日，穆勒发表了《中国高尔基》一文，向东德读者介绍中国“道路”，即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作家鲁迅。R ü tten Loening 出版社 1952 年出版了《中国人的高尔基》，Josi von Ruskoll 将该书从俄语翻译成德语，《中国的高尔基：关于鲁迅的小说》是该书的书评。穆勒指出，这次翻译终于开始填补德国图书市场在鲁迅小说方面的空白。穆勒欣赏鲁迅独特的讽刺写作风格，尽管他面临着国家镇压的危险。^[17]1925 年，鲁迅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创作讽刺作品，他也被迫以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展示受压迫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处境，并从相对中立的人的角度描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17]

4. 鲁迅研究在德语区国家的新趋势

4.1 研究视角多元化

早期德语国家的鲁迅研究主要关注其生平、作品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主要关注鲁迅的社会政治思想，将鲁迅视为革命家或社会批评家。7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重点转向鲁迅的文学和叙事技巧，运用西方文学理论进行分析。90 年代，受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研究更加注重文本本身，探讨鲁迅作品中的叙述情境、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进入 21 世纪，

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不仅关注鲁迅的文学作品，还关注其作为作家所产生的世界文学遗产的物质性，例如纪念鲁迅的场所、物品、媒介等方面，以及鲁迅作为版画家的贡献等。德语国家的鲁迅研究逐渐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

4.2 研究方法多样化

研究早期，主要采用传记研究、社会历史批评等方法。70 年代至今，引入叙事学、文本分析、互文性分析等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21 世纪起，更加注重跨学科研究，将鲁迅研究与艺术史、文化研究等领域相结合。德语国家的鲁迅研究在方法上不断创新，运用叙事理论、文化批判、后结构主义理论等多种方法和模型进行解释和分析。这些方法的应用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也深化了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和解读。德语国家的鲁迅研究成果丰硕，包括学术论文、专著、译本等多种形式。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鲁迅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为国际鲁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4.3 研究对象的拓展

早期，主要关注鲁迅的短篇小说和杂文。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研究对象扩展到鲁迅的诗歌、散文诗、日记、书信等，甚至包括鲁迅的翻译作品和鲁迅研究史。如今，鲁迅研究的对象进一步多元化，例如 Täubner 等学者研究了鲁迅在中国被神圣化及非神圣化的过程。鲁迅作品的戏剧化成为研究热点，如对《阿 Q 正传》戏剧改编的研究。鲁迅作为世界文学遗产的物质性，尤其是对其博物馆的研究。从跨文化角度对比分析鲁迅与其他作家的叙述技巧。从艺术史角度研究鲁迅作为版画家的贡献，以及他对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作品在东亚传播的影响。国际影响与接受方面，德国作家海纳·穆勒对鲁迅的喜爱和推崇，体现了鲁迅作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4 国际交流的加强

德语国家的鲁迅研究注重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研究和合作项目。例如，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不仅限于德语国家，还涉及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个语种。海纳·穆勒等德国作家和学者对鲁迅的喜爱和介绍，也促进了鲁迅作品在德国的传播和接受。

5. 结语

德语国家的鲁迅研究经历了从翻译引入、基础介绍到深入分析的过程，研究视角不断拓宽，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当

代研究更加注重跨学科、跨文化比较,以及鲁迅作品在全球文学和文化遗产中的地位与影响。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重要代表,其作品在德语国家的持续研究和传播,为增进中德文化交流和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张芸:《鲁迅在德语区》,《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第78页。
- [2] 王家平:《百年来鲁迅在世界上传播的区域格局与重要学派》,《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6期,第4页。
- [3] 王家平:《世纪之交西方鲁迅研究的新趋势(下)》,《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2期,第21-22页。
- [4] 张芸:《鲁迅在德语区》,《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第79页。
- [5] Elisabeth Schneider. Skizze einer literarischen Zeitschrift: Die Anfänge der Yu si und ihre Zielsetzung[J]. Oriens Extremus, 1979, 26(1), p. 182.
- [6] Bernd Eberstein. Rezension zu Lu Xun - Werke in sechs Bänden. <https://www.oag.uni-hamburg.de/noag/noag-155-156-1994/noag-1994-rez-01.pdf>, 2024.08.30, pp. 113-115.
- [7] Michael Quirin. Die chinesische Intelligenz und die Macht[J]. Oriens Extremus, 1995, 38(1), p. 245.
- [8] Aizheng Chen. Numerative und Numerativkonstruktionen im Deutschen und im Chinesischen[M].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96, p. 39.
- [9] 王家平:《世纪之交西方鲁迅研究的新趋势(下)》,《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2期,第25页。
- [10] Clemens Treter. Erzählsituationen, Ich-Erzähler und Ich-Formen bei Lu Xun[J].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999(149), pp. 337-338.
- [11] 张芸:《鲁迅在德语区》,《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第84页。
- [12] Anna Stecher. Staging Lu Xun - Staging Revolution? Eine Studie zu Theatralen Adaptionen der wahren Geschichte des AH Q[J]. Oriens Extremus, 2012(51), pp. 195-196.
- [13] Emily Graf. Lu Xun on Display: Memory, Space and Media in the Making of World Literary Heritage[D].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2017, pp. 412-419.
- [14] Xiaomin Zhou. Erlebte Rede in der literarischen Übersetzung - am Beispiel von Robert Musil, Franz Kafka und Lu Xun[D].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2019, pp. 219-223.
- [15] Birgit Mersmann. Über die Grenzen des Bildes: Kulturelle Differenz und transkulturelle Dynamik im globalen Feld der Kunst[M].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21, p. 103.
- [16] Heike Kotzenberg. Der revolutionäre Holzschnitt Chinas. Künstler aus dem Umkreis von Lu Xun[M]. Köl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1987, p. 121.
- [17] Lianhua He. Geschichtsphilosophie als Literatur - Intertextuelle Analysen zum Werk Heiner Müllers[M]. Bielefeld: transcript, 2022, p. 171.

作者简介:

骆超群, (1986-) 女, 汉族, 浙江诸暨人,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德语教学法、区域国别研究。